

中国西部 民族文化研究 2003年卷

主编：王继光

民族出版社

中国西部民族
文化研究

2003 年卷

主编：王继光 副主编：才让 尹伟先

民族出版社

K282.11
11.027
20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西部民族文化研究 2003 年卷/王继光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9
ISBN 7-105-05184-1

I. 中… II. 王… III. ①民族文化-研究-中国-西南地区②民族文化-研究-中国-西北地区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4936 号

ZHONG GUO XI BU MIN ZU WEN HUA YAN JIU 2003 NIAN JUAN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22.5 字数:577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定价:3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目 录

中国少数民族文献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	王继光(1)
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献概要·····	王继光(5)
玉树州吐蕃时期石刻初探·····	高瑞著 傅千吉译(34)
藏经蒙译简论·····	唐吉思(45)
藏文文献中的“维吾尔”·····	尹伟先(59)
关于突厥、维吾尔文文献中的“吐蕃”·····	尹伟先(76)
藏语文辞书编纂简史·····	尹伟先(101)
藏文辞书编纂史的分期与特点·····	尹伟先(119)
国外《如意宝树史》研究评价·····	尹伟先 曾雪梅(127)
蒙古文《格斯尔传》的产生地点、时间及记录出版者探讨 ·····	玛·乌尼乌兰(135)
北京版《格斯尔传》特征之探讨·····	唐吉思(145)
藏文史籍叙录·····	王继光 才让(154)
关于敦煌古藏文文献整理出版的初步设想 ·····	扎西才让 高瑞(226)
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	王继光 郑炳林(235)
敦煌与吐蕃、回鹘、蒙古学研究·····	杨富学(253)
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借贷文书概述·····	杨富学(263)
陈诚西使及其《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研究··	王继光(276)
辑本《西宁卫志》序·····	王继光(318)
《陇右方志录》补正·····	王继光(339)
《明会川伯赵安铁券》跋·····	王继光(358)
《李南哥墓志》跋·····	王继光(365)

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探研····· 王继光(378)

蒙藏文化交流的使者····· 赵学东(405)

十三至十九世纪藏蒙文化交流评介····· 唐吉思(410)

中国石窟寺艺术渊源简论····· 买丽萍(418)

简析青藏高原上的龙文化····· 才让(422)

试论古代藏族的灵魂观及魂命物····· 才让(431)

藏传佛教中的关公信仰····· 才让(443)

青海藏族的射箭活动及其文化背景····· 才让(456)

西藏历史上的医药学校····· 苏发祥 赵学东(466)

藏族医圣宇陀·元丹贡布····· 赵学东(478)

青海隆务河流域藏文化特点的社会考察····· 刘夏蓓(482)

隆务河流域的藏族及其服饰文化····· 刘夏蓓(499)

青海隆务河流域的“六月会”及其文化内涵····· 刘夏蓓(509)

青藏高原的麝香文化与麝香贸易····· 尹伟先(521)

蒙古族男子三项那达幕的起源与发展····· 玛·乌尼乌兰(540)

怎样看待回族的形成····· 金云峰(545)

怎样看待伊斯兰教入华“标志”和“时间”····· 金云峰(561)

蒙·元时期“回回炮”的东传及作用····· 马建春(580)

元代西域散曲家辑述····· 马建春(590)

元代东传之回回地理学····· 马建春(605)

明代陶瓷与伊斯兰文化····· 马建春(617)

维吾尔族历法初探····· 杨富学(646)

对文化生长与文化生态关系的几点思考····· 金云峰(657)

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文化联系与交流····· 尹伟先(664)

“白哈尔”的传说及其所反映的维、藏民族文化交流	尹伟先(682)
杨增新督新期间的伊斯兰教政策	马明达 王继光(691)
后 记	(712)

中国少数民族文献与中国 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以外,现有五十多个兄弟民族。从远古起,中国各民族就劳动、生息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共同开拓了祖国辽阔的疆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浩如烟海的汉文典籍中,就有大量的关于少数民族的历史记载,大体上可以反映出这些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变迁。

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历史的原因,汉文典籍中关于少数民族的历史记载,存在着种种的缺陷和重大遗漏。局限于这些资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开掘已经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而又蕴藏十分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必将推动包括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在内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导致对整个中国历史得到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而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也将丰富中国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史科学、中国史学史的内容。

我国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少数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不仅促进了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光生辉。文献考古和文献流传证实,我国少数民族古代文字种类繁多,主要有佉卢文、突厥文、回鹘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察合台文、吐蕃文、藏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回鹘式蒙古文(后来演变为托忒文)、八思巴字、蒙古文、满文、彝文、纳西文、老傣文等数十种。用这些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总量很大,内容十分丰富。例如藏文《大藏经》,共收藏文典籍近 5000 部,除了佛教的经律论等有关内明的

著作外,还包括了因明(逻辑学)、声明(语言文字学)、医方明(医药学)、工巧明(星算工艺学)等方面的著作,堪称藏族社会的百科全书,对藏族哲学、历史、文学、语言、艺术、科学、技术诸方面的研讨,都离不开这部蕴藏丰富资料的《大藏经》。又如西夏文文献,无论是数量还是研究价值,在传世的中国民族文字古文献中,都占据相当突出的地位。仅前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的柯兹洛夫在黑城子盗掘的西夏文文书,总登录在 8000 号以上,除部分元刊本佛经外,还有大量的世俗文献,如汉籍西夏文译本、字典、医学、历书、法律文书等。由于西夏亡国后,元人不专修西夏史,史料散佚严重,缺略过甚。这批内容丰富的西夏文文献,对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少数民族文献的学术价值,早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吐蕃王朝崩毁后,文献典籍两《唐书》、《册府元龟》等以及后世藏史著作中的史料,都不足以解开许多历史之谜。二次大战期间,法国藏学家巴考、杜散与英国学者托马斯通力合作,从英法收藏的敦煌吐蕃文书中整理出举世闻名的一份《吐蕃历史文书》,纷乱迷雾般的吐蕃王朝史研究从此改观,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又如维吾尔族历史上著名的《突厥语大词典》是以阿拉伯语拼写、解释突厥语词汇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辞典,它不仅为研究中世纪的突厥语族突厥语言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而且对 11 世纪前后中亚突厥语族的族名、民族、部落、官职、军事、宗教、文化、饮食、习俗、天文、地理、矿产、风土等等,都有详细的记载,因此获得了很高评价,被誉为打开中亚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又如出自敦煌的一组题为《甘州回鹘纪事》的于阗文书,系当时于阗使臣出使甘州、沙州归来后向于阗王的奏稿,它为早期甘州回鹘发生的一场动乱及平定提供了目击者的证词,可补汉文史料的缺略。

但是,如此丰富而详实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献,在传统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中,明显是一薄弱环节。究其原因,大略有如下

情况:

其一,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内华夏,外夷狄”的正统思想占着主导地位。体现在古典文献学中,根本不注意民族文献。卷帙浩繁的文献目录学著作中,从无民族文献的一席之地。

以被誉为蒙文三大典籍之一的《蒙古秘史》为例,在清末流传海外后,引起国际蒙元史研究界的高度重视,被译为多国文字,广为留布,研究蔚成风气,形成研究这本书的“秘史学”。据有人统计,截至1975年,关于《蒙古秘史》的音写、译注及研究论著已达300种以上。然而这部书的回鹘式蒙古文的原本早已亡佚,之所以能够传世,仅仅是因为明初四夷馆译员为教习蒙古语的需要,用汉字音写蒙古语原文逐字旁译,析分段节,题为《元朝秘史》。明代《千顷堂书目》、《内阁书目》和清初孙承泽的《元朝典故编年考》中曾经著录,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元朝秘史》竟被剔除。到阮元编纂《四库全书未收书目提要》时,才补入著录。这大约还是古典书目中惟一著录的一部民族文献,因而也就谈不到为民族文献建一类目了。

正是由于这种传统的认识,近世以来的中国文献学研究中,少数民族文献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研究。

其二,各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是伴随近代西方国家在中国“探险”“考古”而发现被盗运国外的,造成了我国少数民族文献的严重外流。这种状况,必然限制和影响到我们对民族文献的了解和研究。例如吐蕃王朝时期的历史文献,主要是20世纪初在我国新疆南部出土的竹木简牍和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文书写卷,几乎全部流散到英、法、德、日等国。据法国女藏学家拉露整理的目录,仅伯希和、斯坦因盗走而收藏于法、英两国的敦煌吐蕃文书写卷即达五千件以上,未曾整理的残页碎片还不包括在内。又如西夏文历史文献,国内仅存一些金石碑铭,而俄国柯兹洛夫在西夏古都黑城子的发掘,得到的西夏文书和遗物在8000件以上,现在

公诸于世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前苏联的“西夏学”研究之所以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与占有这批西夏文献有直接关系。

其三,目前,注意少数民族文献研究的多为专门史与断代史的学者,从事传统文献学研究的学者,总是不能超越汉文典籍经史子集的藩篱,学科陈旧,代代相因,缺乏开拓与创新。因之,对民族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至今未能引起历史文献学界的重视。自然,也很少有人把它提高到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的高度去认识。

总之,忽略或者排斥少数民族历史文献,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中,是不正常的,这种现状,亟待改变。

1999年修订出版的,由谢玉杰、王继光两位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民族出版社)在这一方面作了一个有益的尝试。该书专列“少数民族文献”一章,将中国少数民族文献视为中国历史文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对建立中国历史文献学科学的、规范的学科体系,应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献概要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以外,现有五十五个兄弟民族。从远古起,我国各民族就劳动、生息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共同开拓了祖国辽阔的疆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我国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少数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不仅促进了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光生辉。文献考古和文献流传证实,我国少数民族古文字种类繁多,主要有: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满文、藏文、彝文、东巴文、白文、傣文等二十多种。用这些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总量很大,内容十分丰富,其史学价值早就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佉卢文历史文献】 所谓“佉卢文”,是一种由音节字母组成的文字符号,其书写方式是由右向左横书。用这种文字所书写的语言并不称为“佉卢语”,而是印度语系的西北俗语。这种文字在古代曾使用于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及我国新疆古于阗、鄯善一带。

佉卢文字的最早发现是 1874 年,英国福赛斯使团在我国新疆首次发掘到两枚“汉佉二体钱”。之后,俄、英、法等国驻新疆的外交使团和探险队陆续在新疆搜求到一批“汉佉二体钱”、佉卢文书写的《法句经》抄本残叶及佉卢文书。其中,以斯坦因三次西

域考古收获最丰，搜括掠走的佉卢文书多达 753 件，汉佉二体钱多达 187 枚。1905 年，美国人亨廷顿又在新疆尼雅遗址找到 6 件佉卢文书。波义尔、腊普森、森纳、诺布耳等人合作整理，把斯坦因与亨廷顿所得的佉卢文书共 764 件用拉丁文转写，合编为三册，题为《斯坦因在中国突厥斯坦所发现的佉卢文字集录》，于 1920—1929 年间出版。建国以来，新疆博物馆、甘肃博物馆收藏的佉卢文书也在百件以上，目前尚未系统整理研究。

新疆所出的佉卢文文献分属古代于阗王国和鄯善王国，其中绝大多数是鄯善王国时期的佉卢文文书。这些文书以世俗文书为大宗，其主要内容为：国王敕谕、公私信札、契约借券、簿籍账历，涉及到鄯善王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司法、军事、交通、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題，史料价值极为珍贵。以前，学术界对古于阗、鄯善王国的研究，主要依据古希腊、罗马经典和汉文史料，不免间接片断。佉卢文书的发现，为公元 2 世纪末至 4、5 世纪于阗、鄯善国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同时，因为于阗、鄯善在古丝绸之路之路上的重要地位，佉卢文书的发现为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

【焉耆—龟兹文历史文献】 焉耆—龟兹文旧称“吐火罗文”，本世纪初发现于我国新疆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学者认为，这种用印度婆罗米斜体书写的古老文字，属印欧语系 Centum 语族。有甲乙两种方言：甲方言主要使用于焉耆—高昌（今吐鲁番）一带，乙方言则限于古龟兹（今库车）地区。因此，过去有人分别称为“甲种吐火罗语”、“乙种吐火罗语”。

焉耆—龟兹文的解读与定名经历过一个复杂的研究过程，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外学者对这种“未知的语言”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研和论战，直到本世纪 70 年代，才确认这种语言与吐火罗故国无关，实际上就是古代焉耆—龟兹民族使用过的一种古

老语言，它在中印文化交流中曾起过桥梁作用。1980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会上，正式把旧称“吐火罗文”改为“焉耆—龟兹文”。

外国探险队的掠夺使我国焉耆—龟兹文文献大量外流，传世的文献现在分别藏于柏林、巴黎、伦敦、圣彼得堡、新德里、东京等地。建国以后，新疆又发现焉耆—龟兹文《弥勒会见记》残页，今藏新疆博物馆。

焉耆—龟兹文文献内容丰富，主要有三类：①文学作品；②宗教文献，主要是佛教文献；③公文、字书、账册、医书、史书、题记等世俗文献。在这些文献中，用焉耆文写成的长达二十七幕的《弥勒会见记》剧本，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个剧本；此外，还有佛本生故事和民间传说；《箴言诗集》等诗歌。

焉耆—龟兹文文献整理刊布的数量不多，多年来对其研究大都侧重语言方面。因此，关于焉耆—龟兹文文献的丰富内涵和史料价值，还有待于资料的进一步整理刊布和深入研究。

【于阗文历史文赋】 于阗文是我国古代于阗地区塞种人居民使用的文字。有楷书、草书、行书三种，字多合体连写，不少字母与古藏文相似，附加元音符号也与古藏文相同。因此，有学者推测古藏文的创制与于阗文有关。

于阗文源出于印度波罗米字笈多正体。用这种文字记录的语言今称为于阗语或于阗塞语。

于阗文书发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疆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和甘肃敦煌藏经洞。最先搜掠于阗文书的是俄、英驻喀什总领事彼得洛夫斯基和马继业。接着，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亨廷顿、桔瑞超、格伦威德尔等，先后搜掠了不少于阗文书，造成我国于阗文献严重流散海外的状况。国内所存，仅为建国以来在新疆出土的少量于阗文书。

于阗文书在年代上绝大多数属于公元7至10世纪,内容上多为佛教经典,也有一批很有价值的世俗文书。这些文书的出土和成功解读。揭示了不少湮没已久的史实,对塞种人、佛教经典、于阗国史乃至整个西域史的研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公元10世纪前,今新疆塔里木地区曾经生活的是操塞语、信仰佛教的塞种人,11世纪初,喀拉汗王朝征服于阗王国,操塞语的居民不断突厥化,于阗也由一个佛教中心变为伊斯兰教流行地区。

最具史料价值的于阗文文献是一些非宗教性的世俗文书,包括敕令、行记、账目、函件、奏报、医药、文学、语汇等内容。数十年来一直受到国内外的重视。例如:

《于阗沙州纪行》,出自敦煌,为钢和泰在北京所得,因称“钢和泰藏卷”,据考写于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叙述于阗王遣使前往沙州,使臣在沙州朝拜佛寺、施捐祈愿等情况,涉及于阗年号、沿途城镇、沙州种族、地理、职官等。

《甘州回鹘纪事》,是出自敦煌的一组于阗文文书,编号为P. 2741、ch. 00296、P. 2790。系当时于阗使臣出使沙州、甘州,适逢甘州回鹘统治集团内讧,于阗使臣向于阗王廷的奏稿。早期甘州回鹘内部的这场动乱及平息后的情形,向为汉文史籍所不载,于阗使臣的奏稿,全属当事人目击,可补汉文史料记载之省略。

《于阗王致曹元忠书》,为于阗王尉迟疏勒致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书信。是考察于阗国与沙州归义军关系的第一手资料。

仅举以上数件文书,便可见于阗文文献的重要价值。

于阗文文献的价值当不至此,如继续深入研究,必续有所得。过去我国学者几乎都是通过外国学者的译文接触一些于阗文文献,未能亲自掌握于阗语文,对于阗文文献的整理、研究、利用自然受到限制。这种状况,近年来始有所改变。

【粟特文历史文献】 粟特在前苏联塔吉克北部和乌兹别克南部，地处阿姆河中游两岸及泽拉夫善河流域。汉时为康居属国，《魏书》始称粟特。隋唐时代，其地为昭武九姓所居。8世纪上半叶，阿拉伯人入侵粟特，其国遂亡。

据语言学家研究，粟特语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曾用粟特文、摩尼文、叙利亚文三种文字书写。后两种文字仅用于书写摩尼教、基督教文献。

粟特人在历史上以善贾著称，是中亚国际商路上的中介。因此，粟特文曾一度为中亚地区通用，后来的回鹘文、蒙古文、满文等文字的创制，都受过粟特文的影响。迄今所发现的最古粟特铭文属于公元2至3世纪，最后消失在公元11世纪。

粟特文出自波斯时代的阿拉美文草书。后来受汉文影响，书写由从右到左横写改为从上到下竖写。

粟特文的发现始于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他们自1902—1905年在我国新疆吐鲁番发掘，获得粟特文经典多种。此后，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等人从敦煌掠走不少粟特文文献。其中，斯坦因在敦煌以西汉代烽燧遗址所获六件粟特文书尤为著名，此即后世聚讼纷纭的《粟特古书简》。在粟特本土，本世纪40年代发现的穆格山文书（约八十件）最有价值。此外，还有粟特文钱币、印章、壁画题记及书简等的发现。

苏联穆格山文书涉及我国者仅有数件，对研究河西历史地理颇有价值。而斯坦因所获《粟特古书简》，则全部涉及我国汉魏时代史事。其第二封书简所述洛阳被焚、天子出亡、匈奴(?)入据一事，为世瞩目。几十年来，国际学术界提出种种假说，迄今未能通解。这些文书还涉及粟特人进入我国河西及中原地区经商的规模、范围、商品、行市等情况，对了解粟特史，研究丝绸之路上的中外贸易、民族变迁，都是难得的材料。

大量的粟特文佛教、摩尼教、基督教经典，对校勘宗教典籍、研

究中古时期中亚地区各种宗教的传播和互相渗透影响，也是大有裨益的。

【突厥文历史文献】“突厥”一词，狭义专指公元 6 世纪至 8 世纪在我国北方建立突厥汗国的突厥族；广义则包括突厥、铁勒、回纥、黠戛斯各部族。而在语言学上，则把古代突厥、回纥（后称回鹘）以及黠戛斯等古代民族的语言及现代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几十种民族语言统称为“突厥语”。“突厥文”指的是古代突厥民族使用的一种拼音文字，突厥汗国、回纥汗国、高昌回鹘王国及黠戛斯、骨利干等语言相近的民族都曾使用过这种文字。由于它与古代北欧日耳曼民族使用的卢尼文外形相似，故又称“突厥卢尼文”；又因这种文字的重要碑文多发现于蒙古鄂尔浑河和叶尼塞河流域，有人称之为“鄂尔浑—叶尼塞文”。此外，还有“兰突厥文”、“西伯利亚文”之称。

古突厥文碑刻从 17 世纪以来就续有发现，但直到 19 世纪末，人们还无法辨识解读这些文字。1889 年，俄国考古队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湖畔发现了汉、突两种文字的《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这使突厥文的辨识和解读成为可能。经俄国突厥语学者拉德洛夫、丹麦著名语言学家汤姆森等人多年努力，古突厥文的解读基本得到解决，为突厥文文献的研究廓清了道路。

现在流传下来的，属于突厥汗国的突厥文历史文献，主要是发现于蒙古高原北部的一些碑铭。这些历史传记性质的碑铭可以《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噶欲谷碑》为代表。阙特勤是辅佐其兄毗伽可汗建国的强有力人物，其碑立于公元 732 年（唐开元二十年）；毗伽可汗是突厥汗国的一代名王，其碑立于公元 735 年（唐开元二十三年）。二碑着重记叙了阙特勤、毗伽可汗的武功勋业，可视作两篇英雄叙事诗。《噶欲谷碑》为噶欲谷生前，大约在毗伽可汗即位后由他本人写成，死后立于其墓前，是一篇自传性的碑

文。这三通碑保存完好,是研究古代突厥汗国史的重要材料。

用古代突厥文书写,属于回鹘汗国的文献保存下来的不多,可分为铭刻和写本两类。碑铭有《葛勒可汗碑》和《保义可汗碑》等,前者纯用突厥文,后者则用了突厥文、粟特文、汉文三种文字,且突厥文刻辞残泐过甚。《葛勒可汗碑》全称为《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主要内容是叙述回鹘第二代汗王磨延啜的征伐事迹。《保义可汗碑》又称《九姓回鹘可汗碑》,主要记载了回鹘从鄂尔浑河流域建立政权至第八代保义可汗的历代汗王,特别记叙了牟羽可汗从唐朝内地传播摩尼教于回鹘地区以及保义可汗出师保卫北庭、龟兹,并进而西征中亚的事迹。古代突厥文写本在新疆和甘肃敦煌石室均有发现,较为重要的有《占卜书》及一些军事、经济文书。上述碑文与写本,对研究回鹘汗国的历史文化有重要价值。

上述碑铭和写本文书,一方面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时期一些著名人物的生平事迹,其间政治派系、内部冲突的史实十分具体;另一方面,透露了当时各民族、各王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大量的人名、地名、族名、部落名、职官名,可与其他文种的史料互相比证、补充。突厥、回纥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亦从中得到生动翔实的反映。

【回鹘文历史文献】 回鹘一称回纥,始见于7世纪之初,其历史则可追溯到公元4、5世纪的铁勒和此前的丁零。公元744年,回鹘首领怀仁可汗建立回鹘汗国。840年,由于内乱及黠戛斯人入侵,回鹘汗国崩毁,回鹘人分三支西迁,分别建立了甘州回鹘地方政权、高昌回鹘(西州回鹘)地方政权和喀喇汗王朝。

回鹘汗国建立后,文字语言仍沿袭突厥汗国时代的突厥文。回鹘西迁后,开始使用依照粟特文字母创制的回鹘文。从9世纪中期至15世纪,回鹘文在中亚、我国新疆地区曾广泛使用。蒙古人早先使用回鹘文,后来在回鹘文基础上创制回鹘式蒙古文。金